

# 中国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研究

## ——基于对工作状况、地区差异与生活方式的分析

李 升 倪寒雨

**内容提要:**中层意识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发挥,本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在分析个人基本属性影响的基础上,主要从工作状况、地区差异与生活方式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当前中国城镇居民中层意识形成的可能因素。研究结论如下:工作状况为被雇佣者、工作缺乏自主性的城镇居民不易形成中层意识,而在党政机关工作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形成存在地区差异,相对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居民较不易形成中层意识,且生活在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也不易形成中层意识;相较于使用互联网等新媒介,日常生活中使用传统媒介的城镇居民更易形成中层意识;仅是“有闲”并不会对中层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需要关注的是存在于“有闲”中的消费因素。研究表明在探讨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问题上,不仅需要分析教育、收入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影响,更需要分析基于参照群体论等视角的多维度因素。

**关键词:**城镇居民;主观阶层认同;中层意识;参照群体论

### 一、问题的提出

主观阶层认同是引导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的中层意识形成则直接关联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的。已有研究指出,与“客观中产”相比,主观意识上的“认同中产”才是积极稳定社会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越是认同自己为中产或接近中产的群体越认可国家的各项制度及社会发展态势,对政府与社会的认知是积极稳定的(李培林、张翼,2008;李升,2017)。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已经表明,“职业中产”占多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多数人持有中层意识才能维持社会稳定,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民众主观认同为中层的比例都较高,也通常被视为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型社会”。那么,当前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状况如何?其中具有社会稳定意义的“中层意识”又当如何讨论?

在中国近几十年巨大的社会结构变革中,由于社会经济状态的升降沉浮,社会阶层不断进行分化和重组,各阶层内成员的相互认同与本阶层意识开始产生较大分歧(李春玲,2004)。较早的研究已指出,中国民

**作者简介:**李升,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文法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乡社会学、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倪寒雨,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14CSH012)。

众在阶层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之间已经出现矛盾与偏移(王春光、李炜,2002),后期的研究也指出,根据个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综合情况,中国转型期的民众在阶层认同方面存在“两头清晰中间模糊”的状况(马广海,2011)。通常来讲,以职业为内核的中产阶层增加应引起中层认同的增强,但从已有研究及经验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的职业中产阶层并未形成清晰的主观阶层认同上的“中层意识”,甚至产生了认同“向下偏移”的倾向(赵延东,2005;高勇,2013;范晓光、陈云松,2015)。因此,在研究中国客观阶层分化的同时,研究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主观阶层认同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关于中层意识的探讨,在此方面具有丰富讨论的是日本学者关于“中流意识”的研究(岩田幸甚,1971;村上泰亮,1987;原纯辅,1990;高坂健次,2000)。日本关于“中流意识”的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多数民众认为自身既不属于下层市民,也没有进入上流社会,而是属于社会的中间位置,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中流意识”(即中层意识)。同时指出,意识上的中层认同体现了对生活状态的平等化认知,这样的意识结构对社会发展表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因而维持了日本的社会稳定。由此,基于对“中层意识”的分析,对照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讨论,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究竟呈现何种态势?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形成?本文将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主观阶层认同不单是一种对于客观社会事实的简单反映,还包括复杂的评价和感受,其中包含了多样化的影响因素。在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通常认为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刘欣,2001;李春玲,2003;张宛丽,2012),提出如收入、权力和教育等个人属性指代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大多数时候是决定阶层认同高低的关键因素。然而,不同的观点也指出,这样的一种基于阶层社会事实的结构地位论在解释上是有限的,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是基于环境对照的参照群体论(陈云松、范晓光,2016)。

参照群体论强调了即便是处于相同的客观阶层位置,由于主体参照比较的群体环境不同,也依然会形成不同的主观评价意识。实际上,自海曼提出“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概念时,就指出人们会根据与参照群体的对比产生主观地位认知(Hyman,1942)。参照群体论中的重要解释机制就是基于发现最低相似点的“相对剥夺论”,即人们在与参照群体对比,如果感觉自身处于优势位置,就会产生“相对满足感”的积极、正向的较高主观评价意识;反之,如果感觉处于劣势位置,则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消极、负向的较低主观评价。前述的日本学者在讨论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日本民众形成的“中流意识”时,也重在强调对生活状态的平等化认知,这实际上是日本民众在与周边他人进行参照对比后得出的主观评价。在此方面,国内学者也指出,基于参照群体的“相对剥夺论”对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地位认知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刘欣,2002;胡荣、叶丽玉,2014;崔岩、黄永亮,2017)。

不过,虽然已有研究指出了参照群体论对解释人们主观阶层认同形成的重要意义,但在具体维度上的实证研究依然是有限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理论回应上的模糊性所导致的,即对人们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影响的参照群体究竟如何判断?或者说究竟应在哪些具体维度上讨论基于参照群体的“相对剥夺”是合适的?对此问题的解答,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或者说并不明确。在参照群体的理论体系中,强调影响

人们参照群体选择的因素除了个人的主体性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因素(庄家炽,2016),而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了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基于此理论前提,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居民“中层意识”的主观阶层认同进行研究时,对其影响因素的选择除了个人基本属性因素外,主要对工作环境中的工作状况、生活环境中的地区差异及生活方式因素展开讨论。

### (一)工作状况与主观阶层认同

工作状况因素是指职业因素之外的工作中的劳动关系、自主性、工作性质等因素,表示了工作中的控制支配关系等内容,而在关系中的位置往往成为人们参照对比自身条件的可能因素。洛克伍德(Lockwood, 1958)最早提出了工作状况是构成阶层位置的重要基础之一,即人们对于工作中控制、支配关系的掌握程度对于其客观阶层存在与主观阶层认同都有着重要影响。赖特(Wright, 1985)也指出,对阶层的分析必须充分意识到组织中控制和支配关系的重要作用,即工作者工作关系的差异性对阶层和阶层意识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传统中,基于财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指代控制支配的权力地位和权力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一般被称为“基本雇佣地位”或“基本雇佣关系”。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工作状况可分为雇主、雇员、自雇佣者三类,这也构成了三种不同的阶层位置,他们形成相互参照系,进而会对主观阶层认同的意识产生影响。

此外,戈德索普(Goldthorpe, 1980)在洛克伍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工作状况不仅指个体在工作体系中的位置,也包含其对于工作的自主选择权,即工作自主性的有无程度也会影响到人们的主观意识。因此,可以认为工作关系中的雇佣位置、自主性有无等表现了阶层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不同体现了职业分化,由此成为人们认知阶层位置的重要指标。国内学者同样指出,工作方式成为区别阶层和权威体系的重要变量之一(李路路等,2012),体现工作状况的组织权威因素会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由于在中国,组织权威较明显地体现在单位性质方面,体制内与体制外、体制内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不同的单位性质,人们的工作状况会有不同,这都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的主观阶层认同。尤其是工作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体制内人员,往往会在比较的基础上认同自身的优越工作状况,也就容易形成相对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

### (二)地区差异与主观阶层认同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并不相同,地区环境自然成了影响人们主观意识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区,人们对于自身社会阶层的认知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如相较于周边社会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会对自身的阶层认同有较高的认知,提升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李强,2000),这其中也会出现地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增强而降低阶层认同的现象。因此,地区差异是探究主观阶层认同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学者们也指出,在当前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背景下,民众对于主观阶层的认同是否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城乡和地区差异对中产阶层的影响,是尚待探究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培林、张翼,2008)。

地区差异不仅包含了不同省市地区的差异,还包含了不同居住区域的差异。居住区域因素的核心是以住房为根本的居住空间因素,由于住房等居住因素包含了个体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体现了很强的社会阶层性特征(刘精明、李路路,2005)。由于不同阶层对于居住环境会有不同的选择意向,因此,居住位置等地区因素往往成为人们在生活水平认知上互相参照对比的重要内容,这也就与主观阶层认同紧密地关联起来。在此方面,有研究指出,工业化导致了西方国家郊区化现象显著,城市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由内而外做离心运动(周一星,1999),即中产阶层成了郊区化主力,而中国也出现

了类似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郊区化现象(田毅鹏,2008)。尽管如此,从多数经验现实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更主要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区域。在这样的地区生活,中产阶层群体能够树立起自身优势位置的认知意识,也就更容易获得较高的阶层认同的主观评价。

### (三)生活方式与主观阶层认同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呈现的生活及习惯模式,在社会学家韦伯那里,生活方式成为划分社会地位群体的主要维度(韦伯,1997:254),即社会成员通过比较区分生活方式以标识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因此,在一定生活环境下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联结或区别于参照群体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构建自身的主观阶层认同发生作用。生活方式显在的表现就是消费,消费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作为生活方式的主要构成部分,既是用于构建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学者指出,各社会阶层有其固有的消费特征,并在深层次关联于自身认为自己“是谁”的这一看法(王宁,2001)。人们通过消费的生活方式,会在参照其他群体的基础上给自身带来社会阶层地位的意识与感知,这是消费作为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主要表现,因此,不同的消费方式会产生不同的阶层认同评价。

在阶层研究领域,消费往往与中产阶层认同关联起来,“消费前卫”是中产阶层的特征之一,也是社会学对于中产阶层性格的普遍评价。在论述中产阶层的美好愿望时,布迪厄将之称为在儿时被反复灌输的“惯习”,使得中产阶层对于上层的依附感和追求通过消费生活方式的特点而得到强化,进一步指出阶层“惯习”不同导致的结果体现在文化消费等实践活动中(布迪厄,2004)。而凡勃伦(1964)在《有闲阶级论》中描述的中产阶层期望于模仿和追随上层阶级奢华与享受、品位与炫耀的消费方式,也成为中产阶层消费的经典形象。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也指出,消费总量的增长已经不能表现中产阶层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结构的独特化,自2002年以来,中产阶层在教育、旅游、品牌消费品的支出上明显高于下层,而奢侈品、艺术品消费则高出下层近一倍(刘毅,2008)。在消费因素之外,生活中的“炫耀性有闲”也被视为标识优势社会阶层地位的重要因素(凡勃伦,1964),一般而言,中产或社会上层群体能够通过拥有金钱资本以享受闲暇,能够在“有闲”的时间内开展娱乐或消费等非生产性活动。因此,从已有研究不难看出,无论是人们生活中的消费方式抑或闲暇使用方式等,都与中产阶层意识紧密的关联在一起。

此外,媒介使用也是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媒介使用的差异也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理查德·奥德曼(Ohmann,1996)对美国杂志进行的研究指出,杂志通过提供特定的信息和兴趣点,可以连接同样生活圈子的读者并在全中国范围内将具有相近想法的人们从文化上组织起来,可以使人们形成一个共同体并标识其社会地位。当前,媒介产品的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家庭日常生活交往的主要方式。一方面,传统媒介作为日常生活过程中的一类附属品影响了使用群体的主观阶层认知;另一方面,互联网等新媒介的使用会增强人们的信息资本,也会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李升,2006)。互联网的普及搭建了一个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平台(哈贝马斯,1999),使公众在社会事件中更具有参与感,由这样的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起的话语权也成为影响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探讨方面,已有研究也指出了大众传媒与中产阶层身份构建之间的重要关联意义(何晶,2009;郭瑾,2014)。

基于前述关于工作状况、地区差异及生活方式因素与主观阶层认同关联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工作状况假设

假设1-1:相较于自雇者,受雇者较不易形成中层意识;



假设1-2:工作过程中越具有自主决定性的人更易具有中层意识;

假设1-3:在党政机关等体制内工作的人更易形成中层意识。

假设2:地区差异假设

假设2-1: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越高,越易形成中层意识;

假设2-2:居住在城市中心区的城镇居民更易形成中层意识。

假设3:生活方式假设

假设3-1:有空闲时间进行娱乐休闲活动的人更易形成中层意识;

假设3-2:经常进行享受型消费的人更易形成中层意识;

假设3-3:与使用传统媒介相比,使用网络等新媒体的人更易形成中层意识。

### 三、数据与变量分析

####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研究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2013年数据共抽取样本11438个,涉及28个省市。本文研究的是其中城镇居民样本(样本量为7022),具体指的是居住生活在城镇中的居民。

分析因变量为是否具有“中层意识”的主观阶层认同,选取的数据分析模型为logistic回归模型,操作化方法借鉴日本社会学界关于中层意识的分析方法。在以日本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SSM)为代表的大规模调查中,测量中层意识时,是将主观阶层归属划分为“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类别,在分析时将其中的“上”归为“上层意识”、将“中上”和“中下”归为“中层意识”,将“下上”和“下下”归为“下层意识”。由此,基于CGSS问卷调查方式,根据“你认为自己所在1~10层哪一层”的问题,将阶层认同做二分的虚拟变量处理,其中,“主观阶层认同为下层”(得分1~4)的编码为0,“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的”(得分5~8)为1。由于2013年调查数据中9~10层(认同为上层)的比例非常小,不足0.5%,故在模型分析中不做讨论,以此产生的模型分析样本量为7000。

作为分析影响“中层意识”认同的自变量因素,是在分析个人基本属性因素的基础上,探讨地区差异、工作状况、生活方式的三个维度的自变量影响。具体分析内容为:(1)个人基本属性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个人收入、户口登记方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2)地区差异因素,包括GDP总量排序的省份地区以及居民在城镇中的居住区域;(3)工作状况因素,包括工作关系状况、自主决定工作的方式以及工作单位类型;(4)生活方式因素,包括媒介使用、空闲时间以及消费状况。

自变量具体的操作化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在消费状况中,选取了问卷关于生活习惯的量表中“除非必要,我和家人从不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生日或节日会去餐馆聚餐”、“总是到有名气的商店购物”、“出门总是乘坐小汽车或出租车”、“家庭耐用消费品都是高档名牌”、“用艺术品装饰家庭气氛”这6个与消费相关的问题,将其选项分数进行加和后形成连续变量。同时选取了问卷中的空闲时间从事何种活动的活动结果,将城镇居民空闲时间进行电视、电影、购物、读书等一系列消遣活动的频率进行选项得分加和形成连续变量。在媒介使用问题上,选取问卷中作为信息来源的媒介使用状况,将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划作为传统媒介使用,将互联网与手机网络作为新媒体使用,以此操作为传统媒介使用与新媒体使用的二分变量。

表1  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统计与描述性分析结果(N=7000)

变量名	频数	频率(%)	变量名	频数	频率(%)
基本属性			工作状态		
性别			工作关系状况		
1=男	3536	50.5	1=老板或合伙人	77	2.1
0=女	3464	49.5	2=个体工商户	654	17.6
年龄			3=受雇于他人	2402	64.7
最大值=96		全距=80	4=劳工或临时工	395	10.6
最小值=17		标准差=16.6	5=自由职业者	187	5
均值=47.6		N=7000	决定工作方式		
受教育水平			0=自主决定	2426	65.6
1=小学及以下	1516	21.7	1=缺乏自主	1273	34.4
2=初中	1970	28.1	工作单位类型		
3=高中、中专	1788	25.5	1=党政机关	162	4.4
4=大专及以上	1726	24.7	2=企业单位	1753	47.3
个人收入(取对数)			3=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596	16.1
最大值=14		全距=8	4=无单位或自雇	1192	32.2
最小值=6		标准差=1.0	生活方式		
均值=9.90		N=7000	消费状况(加和)		
家庭经济状况			MAX=16		全距=12
1=平均线以上	4803	68.6	MIN=4		标准差=2.5
0=平均线以下	2197	31.4	均值=12.7		N=7000
户口登记			空闲时间(加和)		
1=非农户口	4818	68.8	MAX=60		全距=41
0=农业户口	2182	31.2	MIN=19		标准差=6.6
地区差异			均值=43.3		N=7000
省份地区(当年GDP总量分)			媒介使用		
1=4 万亿元及以上省份	1029	14.7	1=新媒介	1983	29.1
2=2 万亿~4 万亿元(不含)省份	2518	36.0	0=传统媒介	4839	70.9
3=1 万亿~2 万亿元(不含)省份	3088	44.1			
4=1 万亿元以下省份	365	5.2			
居住地区					
1=城中心以外	4203	60.0			
0=城中心	2797	40.0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1. 因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

模型中作为因变量的主观阶层认同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有效统计的7000人样本中,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下层的占比是44.5%,而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的人数比例为55.5%。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在主观阶层认同上,有相对较多的人认同自己处于社会的中层,反映出中国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相对明确化且中层意识规模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比重并没有达到绝大多数,持有下层意识的城镇居民还

占有较大比例。

表 2 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操作与描述性分析结果

	频数	频率(%)
主观认同下层	3113	44.5
主观认同中层	3887	55.5
合计	7000	100

已有阶层理论探讨中层意识的重要意义在于,主观阶层认同为社会中层的人往往具有相对稳定且积极的社会心态,因此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具有正向的功能。从城镇居民不同主观阶层认同与生活幸福感、人际关系满意度及社会公平感等社会心态的交互分析结果(表 3)可以看出,与主观阶层认同为“下层”的城镇居民相比,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的人认为生活幸福的比例(下层 61.0%,中层 79.5%)、对人际关系满意的比 例(下层 26.1%,中层 34.1%)、认为社会公平的比例(下层 27.2%,中层 41.0%)均相对较高。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与已有阶层理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具有中层意识的中国城镇居民,其社会心态相对稳定积极,对现实生活状态认可度较高。

表 3 不同主观阶层认同的城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人际关系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描述

主观阶层认同	城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N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合计	
中层	0.5	3.9	16.1	60.9	18.6	100	3873
下层	2.6	10.5	25.9	52.1	8.9	100	3098
	城镇居民的人际关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合计	
中层	2.1	15.3	48.5	32.5	1.6	100	1887
下层	3.7	21.0	49.2	24.6	1.5	100	1564
	城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完全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说不上	比较公平	完全公平	合计	
中层	5.7	27.9	25.4	38.6	2.4	100	3109
下层	12.3	35.6	24.9	25.8	1.4	100	3884

2. 自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

模型中作为影响因素的自变量描述性分析如表 1 所示,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在工作状况方面,调查数据中有固定雇主的受雇者比例最多,约占 2/3,其次是个体工商户(17.6%)和劳 务工或临时工(10.6%),老板或自由职业者的比例相对很小;在这样的雇佣关系下,在工作中能自主决定工作方 式的比例也达到约 2/3 比例;而在就业的单位性质上,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数比例最大,达到了近半数,无 单位或自雇状况的比例也达到了近 1/3。

在地区差异方面,CGSS2013 调查除了广东、江苏、山东等 GDP 总量大省外,还涉及了 22 个其他省市。在 这 28 个省市中 GDP 总量高于 2 万亿元的(即 1~2 等)占到了总数的 50.7%,GDP 总量在 1 万亿元以下的省份比 例较少(5.2%)。居住地在“城中心”的比例为 40%,居住在“城中心以外”地区的比例为 60%。

在生活方式方面,在空闲时间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的得分分布上,被调查者的平均得分较高,多数人拥有 能够一月数次参加休闲娱乐活动的空闲。在生活消费习惯的测量中,在涉及购物种类、购物频率、购物方式

的问题中,选择居中状态的人数居多,即他们偶尔会聚餐、购买高档商品、乘坐出租车和小汽车、去名牌商店购物等,比例达到了约2/3。在信息媒介的使用方面,城镇居民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的传统媒介使用比例较高,对于互联网、手机网络等新媒介的使用比例不足1/3。

### (三)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城镇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因变量的二分类(中层—下层)属性,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在自变量分析方面设计了4个模块(基本属性、工作状况、地区差异和生活方式)进行验证,具体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 1.基本属性因素分析

在个人基本属性影响方面,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个人收入与家庭经济状况都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城镇社会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易形成中层意识,受教育程度低的城镇居民不易形成中层意识,个人收入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对于中层的认同感越明显。这符合日本学者直井道子等人提出的,高收入容易使人认为自己处于富裕的一类,进而导致中层认同的阶层意识形成(渡边雅男,1998)。而年龄对于阶层的认同影响较不显著,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提出的“年龄越大,主观阶层认同越高”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或许表现出不同时期城镇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在年龄维度发生了变化。在户籍差异影响方面,相比居住生活在城镇的农业户籍居民,非农户口居民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表明城乡二元制度因素的影响依然较大,反映出流动的农业户籍人口很难在城市生活过程中获得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

#### 2.工作状况因素分析

在工作状况影响方面,决定工作方式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有着显著影响,决定工作方式越具有自主性,主观阶层认同越偏向中层。在工作关系状况方面,受雇佣者相对来说不容易形成中层意识。在工作单位类型方面,就职于党政机关的城镇居民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这些工作状况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表现,与学者提出的“在社会阶层状况、雇佣状况、阶层地位认同和生活方式上,权威阶层体系中的各阶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李路路等,2012)的观点吻合。

工作状况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工作自主性的决定方式多源于管理岗位或大型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职业认同度高的群体(李春玲,2003),工作的自主性越高,对职业和组织的认同度也相应越高,就会提升自身的主观阶层认同度。如果工作缺乏自主性,或者常处于受雇佣位置,则会给个体带来的阶层压迫感甚至被剥夺感,就不容易形成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另一方面,党政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表现出显著的主观阶层认同较高的现象,与职业阶层是以权力和工作自主性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客观阶层划分标准吻合(刘精明、李路路,2005)。在党政机关单位工作,会明显感受到体制内组织权威的优越性,就会更容易形成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调查数据还显示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中获益最多的群体为“党政机关干部”,这也反映出党政机关单位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体制中掌握一定的权力,享受更高的社会声望,这种职业群体的“地位优越感”使他们更认同自己为社会中层。

#### 3.地区差异因素分析

在省份地区差异影响方面,GDP总量的多少表示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地区差异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相对于GDP总量低于1万亿元的地区,GDP总量在1万亿~4万亿元地区的城镇居民较不容易形成中层意识,且GDP总量高于4万亿元地区的城镇居民并不会明显形



表4 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影响因素分析(logistic模型)

	自变量	B	S.E.	Exp(B)
基本属性	性别(女=0)	-.299***	.087	.742
	年龄	.005	.005	1.005
	受教育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			
	(1)小学及以下	-.353*	.190	.703
	(2)初中	-.112	.135	.894
	(3)高中、中专	-.200	.114	.819
	户口登记情况(非农户口=0)	-.291**	.102	.747
	个人年收入(对数)	.294***	.064	1.342
	家庭经济情况(平均线以下=0)	1.339***	.094	3.816
工作状态	工作关系状况(以自由职业者为参照)			
	(1)老板或合伙人	-.565	.389	.568
	(2)个体工商户	-.276	.216	.759
	(3)受雇于他人	-.666**	.229	.514
	(4)劳务工临时工	.053	.237	1.055
	决定工作方式(自主决定=0)	-.249**	.094	.779
	工作单位类型(以无单位或自雇为参照)			
	(1)党政机关	.884***	.250	2.421
	(2)企业单位	.272	.142	1.312
	(3)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266	.174	1.304
地区差异	省份地区 (以GDP总量低于1万亿元地区为参照)			
	(1)GDP总量高于5万亿元	.057	.198	1.058
	(2)GDP总量为2万亿~4万亿元	-.349*	.179	.705
	(3)GDP总量为1万亿~2万亿元	-.448**	.178	.639
	城市居住地区(城中心=0)	.222**	.088	1.248
生活方式	消费状况	-.135***	.020	.874
	空闲时间	-.013	.008	.987
	媒介使用(传统媒介=0)	-.294**	.103	.745
		-.324	.877	.723
常量	卡方	660.330***		
	拟R <sup>2</sup>	0.254		
	N	7000		

注：\*p<0.05,\*\*p<0.01,\*\*\*p<0.001。

成中层意识。在居住地区差异影响方面,表4的分析结果显示,与居住在城中心区域相比,居住在城中心以外地区的城镇居民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

分析结果显示出经济水平较高省份地区,或居住在城中心区域的城镇居民并不易形成中层意识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与研究假设完全相反。这样的结果可能需要从参照群体论的“相对剥夺感”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解释为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的时候,通常选择的都是周围熟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城中

心的人周围也都是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那么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可能反而更高,中层意识也就会更低。数据结果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是不匹配的,表明城镇居民一旦在参照对比中不能产生获得感,就容易产生向下的阶层认同感。此外,中产阶层的“郊区化志向”也需要注意。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中心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商业和办公,新建的条件较好的居住区域逐渐外围化,居住功能外迁现象开始显现出来。中产阶层也在随着交通出行方式的变化选择城市周边区域居住,调查数据中反映出的多数人交通出行选择小汽车或者出租车这样的方式也体现了这一趋向特征,而离中心化的志向也会影响到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

#### 4. 生活方式因素分析

在生活方式影响方面,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显著的是消费方式和媒介使用因素,空闲时间因素并不会对中层意识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越符合调查问题中描述的“节日聚餐”、“名牌购物”、“出租车或小汽车出行”、“耐用消费品较高档”,以及“用艺术品装饰家”等消费行为的城镇居民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而仅有空闲活动时间则并不能带来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这可以解释为人们更倾向于利用消费方式而非空闲活动表达个人身份与社会地位,消费更能够凸现与其他阶层或群体对照区分的象征意义。正如凡勃伦(1964)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有闲阶级的消费物品是被用来区分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从而提升自身的阶层认同。中产阶层扮演着消费前卫的角色,要领先于其他社会群体,会成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及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以此寻求自我表现和社会认同的空间(鲍德里亚,2001)。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人们的消费也越来越丰富且多元化,数据结果无疑显示了消费成为人们标识自身中产符号的重要意义。

媒介使用因素对城镇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同样影响显著,但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手机网络等新媒介并不会促成人们中层意识的形成。对此解释可以依据群体参照的逻辑,随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手机和网络的普及率也随之上升,对于新媒介的使用已经成为当前城镇居民的“家常便饭”,广泛的使用率拉近了居民之间的阶层距离,使用新媒介已不再是中上阶层的“特权”,在相互参照对比的日常生活中,新媒介使用已不能使人们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形成中层意识评价。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使用则成了显著影响阶层认同的因素,这也一定程度表明在新媒介普及的当前,城镇居民在传统媒介使用上的参照比较或许更为重要。在关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讨论中,阅读报纸在快节奏的城镇生活中成了有时间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广播(包括FM电台)和电视则成为有闲者的家庭娱乐生活方式,使用传统媒介并不一定表示过传统的生活,作为文本的传统媒介会为中国中产阶层提供文化趣味标准,使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产文化符号(孟繁华,2004)。因此,对于传统媒介或新媒介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

##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的定量分析,本文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中层意识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超越半数的中国城镇居民主观阶层认同表现为中层意识,并关联了积极稳定的社会态度,这表明中层意识具有积极稳定功能的社会意义。在对中国城镇居民中层意识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上,以对指代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收入等因素分析为基础,重点讨论了基于参

照群体论的工作状况、地区差异及生活方式的三个维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工作状况对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形成具有显著影响。被雇用者、工作缺乏自主性者不易形成中层意识,而在党政机关工作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研究结论验证了提出的“工作状况假设”,也表明在具体工作环境中的群体参照能够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在中国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工作状况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有体制内的就业者,也有体制外的就业者,既有工作自主性高的自雇佣者,也有工作自主性低的受雇佣者。因此,在探讨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及其主观阶层认同问题时,仍需要在工作关系、工作性质及工作单位类型等工作状况维度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分析。

第二,中国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状况会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高等水平地区的居民较不易形成中层意识,且生活在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也不易形成中层意识。研究结论与提出的“地区差异假设”存在差异,或者说成为研究假设的反证。研究表明了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空间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关联性,但在具体分析生活区域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时,需要考虑人们在居住空间上参照群体效应,在表面上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区可能不能使人们产生出中层意识的主观阶层认同。

第三,生活方式成为城镇居民中层意识形成的显著影响因素。相较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的使用,使用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的城镇居民更易具有中层意识;而仅是“有闲”并不会对中层意识形成产生影响,具有显著影响的是存在于“有闲”中的消费因素。研究结论验证了提出的“生活方式假设”中的消费假设,也证实了媒介使用假设。当前中国城市越来越走向消费型城市形态,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伴随新媒介技术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且多样化。在这样的城市社会背景下,生活方式中的消费及媒介使用等都可能成为人们进行群体参照并形成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探讨中国城镇居民的社会阶层特征问题上,分析以消费及媒介使用等为主要构成的生活方式因素将是十分必要的。

总体来看,工作状况、地区差异及生活方式因素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作用,这表明在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外,需要多维度和多视角的关注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可能因素。本文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由于在选取调查问题分析上的有限性,在工作状况探讨方面,并未探讨具体工作的场所环境、劳动保障等因素;在操作化地区差异这一变量时,只是使用了GDP总量来划分省份地区,没有再进行更加细化的市区等区域差异分析;对生活方式的探讨也是集中在媒介使用及消费等因素,也未对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局限性将为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可能性,也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发展方向。

#### 参考文献:

- 鲍德里亚,2001,《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崔岩、黄永亮,2017,《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分析——兼议如何构建主观阶层认同上的橄榄型社会》,《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村上泰亮,1987,《新中間大衆の時代》,东京:中央公论社。
- 陈云松、范晓光,2016,《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渡边雅男,1998,《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陆泽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凡勃伦,1964,《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范晓光、陈云松,2015,《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高坂健次,2000,《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第86号。
- 高勇,2013,《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第4期。
- 郭瑾,2014,《大众媒介与中产阶层的身份建构——一项传播社会学视角的文献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9期。
- 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 何晶,2009,《大众传媒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荣、叶丽玉,2014,《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黑龙江社会科学》第5期。
- 李春玲,2003,《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意识》,《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 ,2004,《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福州:鹭江出版社。
- 李升,2006,《“数字鸿沟”: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第6期。
- ,2017,《主客观阶层位置与社会政治态度研究——兼论中国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 刘精明、李路路,2005,《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刘毅,2008,《中产阶层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基于珠江三角洲城镇住户调查的分析》,《经济学家》第3期。
- 马广海,2011,《存在、认同与冲突:转型期我国社会的阶层意识概览》,《山东社会科学》第5期。
- 马克斯·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孟繁华,2004,《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河北学刊》第4期。
-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田毅鹏,2008,《中产阶层郊区化与城市公共文化的衰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 王春光、李炜,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和客观存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王宁,2001,《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岩田幸甚,1971,《現代の中流階級—意識と生活のギャップを探る》,东京:日本経済新闻社。
- 原纯辅,1990,《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2:階層意識の動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
- 张宛丽,2012,《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赵延东,2005,《“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周一星,1999,《对城市郊区化要因势利导》,《城市规划》第4期。
- 庄家炽,2016,《参照群体理论评述》,《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Goldthorpe, J. H. Catriona Llewellyn & Clive Payne.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yman, H.H. 1942. “The Psychology of Status”. *Archives of Psychology*, 269:92-94.
- Lockwood, 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Ohmann Richard M. 1996. *Selling Culture: Magazines, Markets, and Clas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Verso.
- Wright, E.O. 1985.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The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Working Condition,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Lifestyle

LI Sheng NI Han-yu

**Abstract:** The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tabilizer. Based on the 2013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CGSS2013),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work condition,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lifestyle by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the basic individual attribut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working condition is not easy to form the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for the urban residents who are employed or lack of autonomy in their work, but in the working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t is easier to form the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of urban residents, compared with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residents in the areas which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re not easy to form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city are not easy to form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compared with Internet and other new media, urban residents who use traditional media in daily life are more likely to form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the leisure has no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w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s the consumption factor that exists in leisur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 the issu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stratum identification, we need not only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nd income, but also to analyze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based on reference group theory.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Stratum Identification;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Reference Group Theory

(责任编辑:王玉君)